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主义”^{*}

李鑫均

摘 要: 囿于复杂的地缘格局和内部政治斗争,土耳其自建国伊始,“国家主义”就与“自由主义”发展哲学共同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独立。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二者既互相对立又相辅相成的关系。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主义”理论开始在土耳其实现本土化,并借助“骨干运动”的动员具备了民意基础,最终成为凯末尔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工业发展、农业和社会改革以及财政收支平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二元化的经济发展哲学,一方面催生出土耳其实力庞大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也探索出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特殊发展道路,主导了其后数十年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模式。分析“国家主义”在土耳其的沉浮及其影响,对于理解当前土耳其的发展道路与改革举措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土耳其“国家主义”;“骨干运动”;经济建设;工业计划

作者简介: 李鑫均,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2015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44)。

文章编号: 1673-5161(2020)06-0044-2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与‘一带一路’战略研究”(17JZD036)的阶段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自 2002 年执政以来,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以私有化改革为抓手,在经济发展领域取得了瞩目成就,开创出新的“土耳其模式”。然而,正发党强制性出售大量国有企业,推行全盘私有化,似乎正在透支近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国家工业基础。这种依靠私有化盘活市场的经济模式,必须满足营商环境、内外政策与货币汇率稳定等基本条件。然而自 2013 年以来,土耳其的这些关键指标表现欠佳,加之全球经济疲软,正发党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开始走下神坛。

经济大幅滑坡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土耳其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其本质属性也在深入讨论下浮出水面。简单来说,正发党得以安身立命的“土耳其模式”,实际上脱胎自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ş)的“土耳其经济强大过渡计划”,该计划又可追溯至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的改革时期,最终可以溯源至土耳其建国最初的十五年,也就是凯末尔时代。^①土耳其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建设有一种经济发展哲学蔚然成风,那就是“国家主义”。这也解释了一向标榜自由主义的土耳其,何以存在体量巨大且根深蒂固的国有企业。

中国有关土耳其“国家主义”的研究,大多是结合凯末尔主义、现代化等话题辅助展开,主要关注点在经济类型分析^②、自由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过渡^③、国家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的关联^④等方面。然而,对于在资本主义政体上何以嫁接“国家主义”,并形成独特发展模式的核心问题,却研究得不够充分。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结合土耳其语史料进行再探讨,以期丰富国内学术界对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解。

一、“国家主义”在土耳其萌芽的历史条件

近代以降,与绝大多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样,奥斯曼帝国无论在经济结

^① İrfan Kalaycı, “Atatürk’ün Kalkınma Modeli (AKM): Günümüz Sanayisi İçin Kazanımlar,” *Maliye Dergisi*, Sayı: 156, Ocak-Haziran 2009, s. 172.

^② 许今强《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类型分析》,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60-64页;李艳枝《土耳其经济模式变革与伊斯兰复兴运动》,载《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7期,第1-6、36页。

^③ 姜明新《土耳其经济政策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的演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6期,第29-40页;曹瑞涛《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间震荡的富国方略——20世纪土耳其经济改革述评》,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6期,第24-29、79页;黄维民《战后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及评析》,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33-42页;安维华《土耳其结构性经济调整的成就与问题》,载《西亚非洲》1997年第4期,第19-24、78页。

^④ 黄维民《凯末尔主义与国家主义》,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113-119页。

构抑或是统治基础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几乎失去了自主向现代化国家过渡的可能性。然而,土耳其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位置注定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将其完全控制。因此,不同的国内社会阶层在不同的外部势力支持下,逐步形成了秉持不同意识形态的三大主要势力,即以凯末尔为首的资本主义、与共产国际联系紧密的布尔什维克以及守旧势力。这三大势力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维持着脆弱的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守旧势力因奥斯曼帝国战败出现分裂,向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分流,左派运动的上升趋势愈来愈明显。为了争夺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巨头之首的恩维尔帕夏(Enver Paşa)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利后开始倒向苏俄。^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傲慢态度,令恩维尔将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与“世界的寄生虫”等同起来。他认为,“长期以来,贫穷的工农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成为我们党的忠实捍卫者,城市中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则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将反对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作为全民族首要的奋斗目标。”^②

从当时的欧洲版图来看,晚期的奥斯曼帝国似乎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漩涡中心。战后重建的土耳其政府在西方“协助”下,企图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构建资本主义体系。^③与此同时,随着苏俄的强大,土耳其的布尔什维克在其支持下也愈发壮大,其影响力在 1921 年前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流亡苏俄的恩维尔也认为,引入共产主义,或许是唯一一种能够在废墟上重建国家的方法,能够将土耳其从混乱和贫穷中拯救出来。^④

然而,要完成苏俄式的“城市包围农村”革命,对于当时农村人口占八成的土耳其来说困难重重,且这种武装暴动的模式并不被凯末尔所认同,他更倾向于温

① 可考证的土耳其左派运动始于 1908 年,以“社会主义”为旗帜、以报刊为阵地培植了一批拥护者,并在 1909 年掀起了第一场群众运动,民众基础初步形成。1919 年,恩维尔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土耳其法庭判处死刑,这预示着恩维尔很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获得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其势必需要寻求新的支持者。因此,在这一阶段恩维尔的倾向是亲苏俄反帝国主义的,并且获得了苏俄的庇护。虽然其在后期投入了鼓吹泛伊斯兰和泛突厥的运动,但其作为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亲苏俄期间仍然鼓舞了大量的土耳其布尔什维克,其中不乏凯末尔政府的成员。

② Korkut Boratav, *Türkiye'de Devletçilik*, 2. Baskı, Ankara: İmge Kitabevi, 2006, s. 63.

③ Yahya S. Tezel, *Cumhuriyet Döneminin İktisadi Tarihi (1923 - 1950)*,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5, ss. 553-554. 此外,有关土耳其采取何种国家制度立国,《洛桑和约》第 28 条中也称,“综合来看,土耳其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项条件。”参见: Korkut Boratav, *Türkiye'de Devletçilik*, 2. Baskı, s. 33.

④ Korkut Boratav, *Türkiye'de Devletçilik*, 2. Baskı, s. 62.

和的革命方式。^① 在萨卡里亚战役中,土耳其以牺牲 5 317 名将士的代价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关键胜利,而在长达四年的民族独立过程中,总伤亡人数也不到 7 万人(不包含被俘)。^② 通过刚柔并济的组合拳,凯末尔对内赢得了极高的政治声誉^③,对外通过打击希腊,最终软化了英法的立场。虽然此时的恩维尔已经无法对凯末尔的统治地位造成实质影响,但其数量庞大的拥护者却对新生共和国的统治基础造成无形的压力。

在“温和革命”理念的指导下,凯末尔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化解压力,不论是国家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抑或是守旧势力都不应被排除在团结的范围之外,就此促成了 1923 年伊兹密尔经济会议的召开。会议期间,凯末尔的亲密战友马哈茂德·艾萨特·博兹库尔特(Mahmut Esat Bozkurt)第一次提出汲取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经济发展上的长处,建立一套土耳其特色的经济发展制度。^④ 土耳其学界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⑤制度。然而,以凯末尔为首的统治核心认为,只有西方模式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⑥且土耳其在当时也缺乏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实力。因此,这项提议很快被搁置,最终确立了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国家重建方案。

博兹库尔特的主张虽然未被采纳,但使凯末尔意识到土耳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民族独立战争实际上已经将土耳其置于外国资本的对立面。凯末尔在分析国内经济形势时曾指出,因为外国资本的压榨使得土耳其的民族资本孱弱,所以并不存在相对应的工业阶层,工人阶级也就无从谈起。土耳其的主要任务还

^① Mete Tunçay, *Türkiye Sol Tarihine Notlar Tarih ve Toplum Yazıları*, İstanbul: İletişim Yayıncılık, 2017, s. 225.

^② Ergün Aybars, *Türkiye Cumhuriyeti Tarihi 1*, İzmir: Ege Üniversitesi Basımevi, 1986, ss. 341-348.

^③ 1921 年 8 月,萨卡里亚战役结束之后,凯末尔被授予元帅军衔和加齐(Gazi)的称号,成为实际上的三军统帅,此后指挥军队进行反攻,收复伊兹密尔等地,奠定了土耳其取得独立的基础。凯末尔因军事上的胜利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威望,其“国父”的地位也稳固下来。与凯末尔争夺民族运动领导权的恩维尔,虽然存有相当一部分支持者,但此时再难以撼动凯末尔的领袖地位。

^④ Erdinç Tokgöz, *Türkiye'nin İktisadi Gelişme Tarihi (1914-2018)*, 11 Baskı, Ankara: İmaj Yayınevi, 2018, s. 65.

^⑤ Hasan Özyurt, “Atatürk Dönemi Birinci Ve İkinci Beş Yıllık Sanayileşme Planları Ve Türk Ekonomisindeki Yapı Değişikliğine Etkileri (1933-1938),” *Sosyoloji Konferansları*, Cilt. 19, 1981, s. 125.

^⑥ Dündar Sağlam, “Devletçilik İlkesinin Gelişmesi ve Günümüzdeki Sonuçları,” *Ekonomik Yaklaşım*, Cilt. 2, Sayı. 4, 1981, s. 92.

是从基础入手,打造与体制相适应的资产阶级。^①当时的土耳其,既不能走英国式的经典资本主义道路,也无法走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凯末尔的“四个黄金平衡”^②理论,在伊兹密尔经济会议上悄悄萌芽。

为了与资产阶级政体相适应,同时缓解与外国资本的对立状况,土耳其必须发展出民族资产阶级,将大量的土耳其民族资本^③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将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为工人,完成资本主义化的初步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土耳其并非遵照市场原则,而是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对国内穆斯林资本家给予政策倾斜,为其发展壮大保驾护航。^④

1927年6月25日,共和人民党政府成立了“最高经济议会”(Âli İktisat Meclisi, AİM),国家力量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得到初步体现,^⑤国有企业在这种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下开始萌芽与发展。与同一时期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类似的组织机构相比,“最高经济议会”的24名成员中,有半数来自军队。^⑥在首次会议上,“最高经济议会”做出弱化市场自由性的决定,确立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涉原则。^⑦该委员会在历史上共召开了10次会议,主要围绕消费品价格、薪资水平、农业贷款、工农业的发展措施等议题进行规划。

从1923年土耳其建国起,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在短短4年内便受到大幅挤压。与当时主流资本主义世界的欣欣向荣相反,土耳其呈现出“逆资本主义”现象,其成因可归结为以下四点:第一,土耳其加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后,并没有受到平等的对待,依然在产业链条中处于原料供应国和工业品倾销地的地位。^⑧第

① İhsan Keser, *Türkiye'de Siyaset ve Devletçilik*, İstanbul: Gündoğan, 1993, s. 71.

② “四个黄金平衡”,即货币均衡、公共财政收支平衡、外贸收支平衡和公私部门比例平衡,要达到这四个平衡,仅仅依靠市场的调节机制是无法实现的。İrfan Kalaycı, “Atatürk'ün Kalkınma Modeli (AKM): Günümüz Sanayisi İçin Kazanımlar,” s. 155.

③ 此后资本土耳其化(Türkleştirme)的改革日趋激进,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借助财产税(Varlık vergisi)公开剥夺少数民族资本的情况,推动国家民族的均质化。

④ Yahya S. Tezel, *Cumhuriyet Döneminin İktisadi Tarihi (1923-1950)*, s. 229.

⑤ Murat Koraltürk, “Âli İktisat Meclisi (1927-1935),” *Ekonomik Yaklaşım*, Cilt. 7, Sayı. 23, 1996, ss. 47-48.

⑥ 其余12名成员由各行业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具体分布情况是:进口商、出口商、工厂主、银行、海运、铁路运输、合作社、证券业、汇兑业务及工矿业代表各一名,农民代表两名。具体可参见Fehmi Akın, Serkan Bayraktar, “Erken Cumhuriyetin İktisadi Kurumlarından Biri: Âli İktisat Meclisi,” *Dumlupınar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Sayı. 29, 2011, s. 117.

⑦ Murat Koraltürk, “Âli İktisat Meclisi (1927-1935),” s. 48.

⑧ Ahmet Akif Mücek, *Türkiye'nin Tarihi ve Ekonomik Politik Yapısı (1838-2016)*, İstanbul: Belge Yayınları, 2019, ss. 277-278.

二,伊兹密尔经济会议确定的自由主义纲领,实质上是多方妥协的结果,并不存在完全的思想统一,在广大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影响甚微,国内经济格局依然复杂。第三,统治集团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全国资本主义改造并不彻底,遗留下了大量封建残余。土耳其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只存在于伊斯坦布尔等几个大城市当中。第四,军事胜利加之历史的偶然,新政权难以脱离奥斯曼帝国晚期政权组织形式的窠臼,延续了“西化”思想指导下军人政府的权力架构,^①帝国末期的一些施政纲领被共和人民党完整地继承了下来。

在如此复杂并且权力高度集中的环境下,自由主义或许是共和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表层现象。“最高经济议会”使得“国家主义”的“星星之火”借助1929年经济危机的东风,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军方干预乃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都获得了合法性。

二、“国家主义”在土耳其的嫁接与发展

1954年,科尔温(Robert W. Kerwin)曾评价道,“新工厂的烟囱就是凯末尔的宣礼塔。”^②对凯末尔来说,工业化程度就是土耳其经济发展的试金石。1927年以前,国家力量成为民族资本发展工业的清道夫。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阶段发展最快的却是商业。因为优渥的工业刺激政策反而成为投机商资本积累的工具,豢养了大量的“寄生虫”^③。从“最高经济议会”的成立到《大演讲》的发表,仅相隔数月,但从中可以察觉出1926年凯末尔刺杀案背后存在不同寻常之处。如果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政权依然无法为人民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那么将面临新的生存危机。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面前,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苏联形成了鲜明对比。以“最高经济议会”为先锋,长期受到压制的“国家主义”重新回到土耳其统治核心的视野。^④

(一) “国家主义”理论的本土化

1929年,土耳其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后,沙克尔·开赛比(Şakir Kesebir)提出反对自由主义的“开赛比计划”,并获得了大国民议会的通过。这项计划除了要

^① Yahya S. Tezel, *Cumhuriyet Döneminin İktisadi Tarihi (1923-1950)*, s. 553.

^② İrfan Kalaycı, “Atatürk Kalkınma (AKM): Günümüz Sanayisi İçin Kazanımlar,” s. 167.

^③ 从1923年到1929年,在国家政策优惠的背景下,大量封建农场主、投机阶层和官僚阶层利用政策漏洞大量套取国家资金,将原本用于支持工业发展的资金大量用于投机商业和土地等,成为当时土耳其经济向工业化转型的最大障碍。

^④ Dündar Sağlam, “Devletçilik İlkesinin Gelişmesi ve Günümüzdeki Sonuçları,” s. 74.

求限制进口之外,还建议国家全方位介入社会经济活动,代替私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在决定改变现有政策之前,凯末尔吸取了之前经济建设的教训,对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德国的纳粹制度都进行了研究,^①试图探索一条真正符合土耳其基本国情的发展之路。

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便有军方背景深厚的“最高经济议会”作为支撑,“国家主义”也不必然能成为经济建设思想的主流。此时土耳其的“国家主义”是国家机器在工业发展受阻且遭遇外部经济危机时所产生的的一种应激反应。在此过程中,土耳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矛盾性,即一方面表现出对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满,不愿轻易放弃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国家大范围干涉经济活动的兴趣。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环境中,即便是“国家主义”支持者,其内部也分裂为两大派别,分别是以总理伊斯迈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为代表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派和以经济部部长杰拉勒·巴亚尔(Celal Bayar)为代表的立足市场经济、国家临时性干预的“适度的国家主义”派。^②

思想不统一使土耳其面临更多不可预估的风险。然而,稳健的领导集体很快便找出了对策。1930年8月12日,在凯末尔的授意下,其亲信法提·欧卡亚(Fethi Okyar)以发扬党内民主的形式,成立反对派自由共和党(Serbest Cumhuriyet Fırkası),其支持市场自由的同时,也强调了国家垄断与商业自由的互补性。^③

自由共和党的主张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伊诺努和巴亚尔两派观点的取长补短,它借助凯末尔亲信欧卡亚之口,暂时缓解了两位政要之间的矛盾。当时的土耳其正在进行贯通首都和东安纳托利亚的铁路(开塞利—锡瓦斯)建设。1930年8月30日,伊诺努在这条铁路的开工仪式上表示,“适度的国家主义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国家和民族理想的必经之路。”^④七年来,土耳其政府一直将铁路的建设和赎买作为国家工业化的核心内容。综合考虑之下,伊诺努

^① Ahmet Fazıl Özsoyulu, *Türkiye Ekonomisi Tarihsel Gelişim*, 3 Baskı, Adana: Karahan Kitabevi, 2016, ss. 42.

^② İstiklâl Yaşar Vural, “Atatürk Dönemi Maliye Politikaları: Liberal İktisattan Karma Ekonomiye,” *Dumlupınar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Sayı. 20, 2008, s. 97.

^③ Rüstem Barış Yeşilay, “Devletçiliğin Türkiye Ekonomisindeki İzduşümleri,” *Atatürk Üniversitesi İktisadi ve İdari Bilimler Dergisi*, Cilt. 19, Sayı. 1, 2005, s. 121.

^④ Şevket Pamuk, *Türkiye'nin 200 Yıllık İktisadi Tarihi*, 9 Basım,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8, s. 188.

的表态在某种程度上明示了国家在工业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①“国家主义”的强势在公共交通领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如果说,经济危机之前土耳其运用国家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做法,是土耳其在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思维过程中的适应性探索。^②那么,从“开赛比计划”到“自由共和党”,再到伊诺努雄心勃勃的宣言,以国家干涉甚至垄断为特点的“适度的国家主义”,又称“混合经济”开始由幕后走向台前^③,适应性探索逐渐落幕,一种新的土耳其模式^④呼之欲出。

1931年5月,共和人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经济国家主义”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⑤基本消除了统治集团之前在思想上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该纲领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指出土耳其的经济制度以私有企业为基本组成要素,私有企业力所不逮之处则由国有企业补足。^⑥1930年~1933年,土耳其连续颁布了保护币值、反对制假售假、成立中央银行、限制进口、商品专卖等一系列法律,从制度层面杜绝了此前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同时,政府确立了三项基本原则:第一,立足于国内原材料和基础农产品市场,有选择地发展工业;第二,建设大型和前沿技术企业;第三,构建内部市场的平衡和补偿机制。^⑦

为了在最大范围内践行这三项基本原则,土耳其必须放手发动民众,改变以往仅依靠官僚和精英阶层的做法。一直以来,凯末尔都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视为威胁,然而共产主义所拥有的强大动员能力却是凯末尔此刻最想得到的力量。

(二) “国家主义”理论的社会巩固

如果上述1927年~1931年土耳其政府的行为仍然不足以说明“国家主义”被接受的程度,那么一个关键人物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国家主义”理论

① Mehmet Dikkaya, Adem Üzümcü, Deniz Özyakışır, *Osmanlı'dan Günümüze Türkiye'nin İktisadi Tarihi*, Ankara: Savaş Kitabevi, 2018, s. 96.

② Korkut Boratav, *Türkiye İktisat Tarihi (1908-2015)*, 23 Baskı, Ankara: İmge Kitabevi, 2018, s. 63.

③ İstiklâl Yaşar Vural, “Atatürk Dönemi Maliye Politikaları: Liberal İktisattan Karma Ekonomiye,” s. 78.

④ 笔者认为,在土耳其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不断变动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土耳其模式”呈现出的内涵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应将其视为一成不变的概念,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将其划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进行考察或许更有时代意义。结合本文所考察的历史年代,本文的“土耳其模式”实际上可以视为“凯末尔模式”。

⑤ Ahmet Akif Mücek, *Türkiye'nin Tarihi ve Ekonomik Politik Yapısı (1838-2016)*, s. 72.

⑥ Ahmet Fazıl Özsoyulu, *Türkiye Ekonomisi Tarihsel Gelişim*, 3 Baskı, ss. 44-45.

⑦ Erdinç Tokgöz, *Türkiye'nin İktisadi Gelişme Tarihi (1914-2018)*, 11 Baskı, s. 78.

的社会基础。沙武凯特·苏莱亚·阿依戴米什(Şevket Süreyya Aydemir)曾长期在莫斯科研习经济,同时也是土耳其共产党党员,致力于在土耳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5年当选为土耳其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所以,当他返回土耳其后不久即遭到逮捕并被判了十年监禁。然而,1927年苏莱亚被改判无罪,次年更是被任命为安卡拉的高级官员,在土耳其的活动空间得以扩大。不管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政治的需要,苏莱亚在“经济国家主义”通过的第二年即发动了“骨干运动”(Kadro Hareketi),一场持续两年(1932年~1934年)的社会动员拉开了帷幕。

在这场运动中,苏莱亚猛烈抨击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强调土耳其仍在其阴影下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土耳其人民不能停止脚步,理应继续革命,^①尤其需要制定符合土耳其国情的经济政策,如国家控制下的工业、贸易保护主义和土地改革。^②如果放在更早的语境下,很难想象土耳其政府能如此“大度”地接受此番论调。相对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前,凯末尔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增强,土耳其政府希望对刚刚出台的“经济国家主义”进行一场社会大讨论,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骨干运动”的核心观点是:土耳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不同于西方,一味模仿会给国家团结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舶来的自由主义并没有令土耳其的经济走向强大,也没有根除盘踞在土耳其核心经济利益上的外国资本;经济上的弱势同时导致了土耳其政治和外交上的无力,因此土耳其需要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特权主义、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国家主义经济发展方式。^③此外,这场运动还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看法:世界上最基本的矛盾并非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对立。这就意味着,这场运动的斗争矛头实际上并不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而是富裕国家的资产阶级,正是因为他们的剥削才造成了诸如土耳其这类新兴国家的贫穷。由此,这场由土耳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左派共同推动的“骨干运动”和“苏联模式”出现了本质区别。

伊兹密尔经济会议催生出的数量巨大的中小型企业,一方面决定了其无法依靠自身,仿效西方国家形成垄断来对抗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模仿苏

^① Fatih Demirci, “Kadro Hareketi ve Kadrocular,” *Dumlupınar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Sayı. 15, 2006, s. 40.

^② Mustafa Türkeş, “A Patriotic Leftist Development-Strategy Proposal In Turkey In The 1930s: The Case Of The Kadro (Cadre) Mo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3, No. 1, 2001, p. 108.

^③ Fatih Demirci, “Kadro Hareketi ve Kadrocular,” s. 45.

联,由国家统一指挥。基于此,“骨干运动”号召探索一条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三条道路”,即借鉴苏联的建设经验,保留市场的同时将国家计划放在首要位置。^①国家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应该从当前基础最薄弱的工业入手,此后逐步控制交通、金融、外贸等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②

从某种程度上说,“骨干运动”可以看作是“经济国家主义”的延伸和扩散。土耳其政府也始终未曾放弃对其监管,在尺度把控和政策框架内都进行了周密的部署。简而言之,就是将“自由共和党”的党内民主方式,通过特定的代言人在社会层面予以推广,使“经济国家主义”在西方获得法理上的合法性,同时也得到了苏联的称赞。

有关“骨干运动”何时停止活动,凯末尔和伊诺努之间曾有一段有趣的谈话。在一次宴会上,凯末尔询问内政部长卡亚(Şükrü Kaya)准备何时结束这场运动。卡亚表示,这需要伊诺努的意见;凯末尔随即转向伊诺努,暗示其时机成熟即可。^③于是,在获得了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之后,“骨干运动”完成了其动员舆论的历史使命,与“自由共和党”一道成为历史,其核心成员大部分被任命为政府官员,成为统治精英的一部分,苏莱亚本人此后更是被擢升为总理府高级顾问。至此,土耳其“国家主义”基本完成了本土化改良,政府人员组成的变动在行政上为其落实提供了便利,国家工业建设的核心力量对比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④

(三) “国家主义”理论的落实

1934年4月17日,土耳其在苏联的财政和技术支持下,开始实施第一个工业“五年计划”(1934年~1938年),目标是解决民众生活中基本工业品的需求问题,确保国家在此过程中的优先地位与核心作用。^⑤虽然工业计划是苏联援建的,但在该计划制定过程中,土耳其也参考了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组织形式,接受美国顾问团的意见。有了美苏的共同参与,土耳其便免去了意识形态的后顾之忧,加之“五年计划”只是针对工业做出了局部生产关系的改变,所以土

① Esra Ergüzelöglü Kilim, “Ülkü’de Devletçilik ve Planlama,” *Memleket Siyaset Yönetim*, Cilt. 2, Sayı. 5, 2007, s. 176.

② Dündar Sağlam, “Devletçilik İlkesinin Gelişmesi ve Günümüzdeki Sonuçları,” s. 72.

③ İlhan Tekeli, Selim İlkin, *Bir Cumhuriyet Öyküsü, Kadrocuları ve Kadro’yu Anlamak*, İstanbul: Tarih Vakfı Yurt Yayınları, 2003, ss. 421, 579.

④ Hasan Özyurt, “Atatürk Dönemi Birinci Ve İkinci Beş Yıllık Sanayileşme Planları Ve Türk Ekonomisindeki Yapı Değişikliğine Etkileri (1933-1938),” s. 126.

⑤ Mehmet Dikkaya, Adem Üzümcü, Deniz Özyakışır, *Osmanlı’dan Günümüze Türkiye’nin İktisadi Tarihi*, s. 96.

耳其在对外宣传时表示,目前正在走出教条,向务实的方向转变。^①

这种“务实态度”最深刻的表现就是,土耳其放弃了此前高投入的大工业建设计划^②,主要针对“三黑三白”^③结合进口替代政策,将国家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纺织工业、采矿及钢铁工业、造纸及纤维工业、陶瓷工业和化学工业等五个产业、共计 23 个新的工业企业上。^④这些新成立的企业遵循最优区位原则,最大程度保证了工业原材料的自给自足。^⑤为了保证各项建设计划的顺利进行,土耳其在 1933 年和 1935 年分别成立了苏美尔银行(Sümerbank)和专司采矿业的埃提银行(Etibank)与实业银行、农业银行共同承担 4,345.3 万里拉的建设预算,然而实际支出却高达 1 亿里拉。为了维持高昂的建设成本,土耳其分别从美国、苏联和英国贷款 2,120 万里拉、1,400 万里拉和 1,800 万里拉。^⑥

在“一五”期间,包括各种资本性的投入在内,土耳其共投入了 10.5 亿里拉,其中政府部门的开支为 5.28 亿里拉,29%用于工业化建设,28.1%用于铁路建设,24%用于公路建设。在民间资本 5.22 亿里拉的投资金额中,46%流向了房地产,23%流向了商贸和服务业,用于工业建设的资本比例仅有 11%。^⑦土耳其政府认为,私有资本相对来说缺乏对发展工业的热情,在疏于管控的情况下,新兴的资产阶级将大量资本投放于房地产、服务业等领域,虽然能在表面上营造出经济复苏的迹象,但在实质上仍然没有改变土耳其落后农业国的现状。

工业计划开始之后,土耳其政府慢慢收缩 1927 年“工业鼓励法”对私有企业的倾斜,削减优惠力度,提高审查标准。1936 年,在各种指标的限制下,私有企业已经很难从“工业鼓励法”中享受到与此前相同的政策优惠。^⑧1931 年~1935 年,土耳其社会经济部门公私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表现为不断壮大的国有

① Hasan Özyurt, “Atatürk Dönemi Birinci Ve İkinci Beş Yıllık Sanayileşme Planları Ve Türk Ekonomisindeki Yapı Değişikliğine Etkileri (1933-1938),” s. 124.

② Özer Özçelik, Güner Tuncer, “Atatürk Dönemi Ekonomi Politikaları,” *Afyon Kocatepe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Cilt. 9, Sayı. 1, 2007, s. 260.

③ “三黑”指煤炭、钢铁与石油,“三白”指面粉、糖与棉花。

④ İlhan Tekeli, Selim İlkin, *Türkiye Belgesel İktisat Tarihi 2: Uygulamaya Geçerken Türkiye’de Devletçiliğin Oluşumu*, İstanbul: Bilge Kültür Sanat, 2009, s. 191.

⑤ Esra Ergüteloğlu Kilim, “Ülkü’de Devletçilik ve Planlama,” s. 185.

⑥ Hüseyin Şahin, *Türkiye Ekonomisi*, 16 Baskı, Bursa: Ezgi Kitabevi Yayınları, 2016, ss. 50, 64.

⑦ S. Rıdvan Karluk, *Türkiye Ekonomisi: Cumhuriyet’in İlanından Günümüze Yapısal Dönüşüm*, 13 Baskı, İstanbul: Beta Basım Yayım, 2014, ss. 265-266.

⑧ Mehmet Dikkaya, Adem Üzümcü, Deniz Özyakışır, *Osmanlı’dan Günümüze Türkiye’nin İktisadi Tarihi*, s. 98.

企业和不断萎缩的私有企业。土耳其第一个工业“五年计划”的成功,标志着基础制造业的控制权发生了转移,国有企业在工业制造能力上代表了土耳其的最高水平。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直接决定了其在全球化中的分工地位,从而间接决定了这一国家的富裕程度。凯末尔认为,“出口大于进口,国民就会富裕”^①。1929年之前,土耳其的年均贸易赤字约为3,000万美元,而通过国家力量对经济活动的干预,1930年~1938年土耳其的对外贸易开始出现年均700万美元的顺差。一五计划的顺利开展令土耳其的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因此,国家干预进一步扩展至教育、公共交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业等领域。^②这在外界看来,土耳其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掌控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由主义政策。^③

作为回应,凯末尔在1936年第二个工业“五年计划”制定时表示,“由土耳其国民共同决定的发展之路,事实证明已经取得了成功……这本来就不是一条自由主义的发展之路。”^④凯末尔在1935年给巴亚尔的书信中表示,“我们国家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它是由国民的基本需求决定的……要管理如此大的国家,兼顾大量人口的生活需求,国家的介入是有必要的。”^⑤综合这两次表态来看,凯末尔希望实现的实际上就是“骨干运动”时所宣称的构想,即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达到双赢的“第三条道路”。

1936年,伊诺努作为实际操盘者,不断加大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型工业和技术型产业几乎完全将私人资本排除在外,引起了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弹。凯末尔坚持认为,“国家力量不能以损害私有企业的利益为前提”^⑥。凯末尔频繁干预总理负责的事务,使得伊诺努心生不满,并于1937年辞去总理职务。^⑦1938年凯末尔辞世后,伊诺努作为二号人物顺理成章地接过国家领导权,从而开启了另一个“国家主义”的时代。

① Kara Kuvvetleri Komutanlığı, *Atatürk'ün Ekonomi Görüşü*, Ankara: KKK yayımları, No. 3, 1982, s. 96.

② Mustafa Aydın Aysan, “Atatürk'ün Ekonomik Görüşü: Devletçilik,” *Atatürk Araştırma Merkezi Dergisi*, Cilt. 2, Sayı. 6, 1986, s. 629.

③ İrfan Kalaycı, “Atatürk'ün Kalkınma Modeli (AKM): Günümüz Sanayisi İçin Kazanımlar,” s. 168.

④ Mustafa Aydın Aysan, “Atatürk'ün Ekonomik Görüşü: Devletçilik,” s. 618.

⑤ Mustafa Aydın Aysan, “Atatürk'ün Ekonomik Görüşü: Devletçilik,” s. 619.

⑥ Erdinç Tokgöz, *Türkiye'nin İktisadi Gelişme Tarihi (1914-2018)*, 11 Baskı, s. 76.

⑦ Cengiz Sunay, “Tek Partili Yılların Ekonomi Politikası,” *Türkiye Günlüğü*, Sayı. 91, Güz 2007, s. 112.

三、土耳其“国家主义”的历史成效

建国初期,土耳其经济建设的核心诉求可简单概括为经济独立、工业快速发展、农业及社会改革和收支平衡四个方面。^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凯末尔时代的“第三条道路”短时间内高效整合了有限的社会资源,满足了国家的基本诉求,达到其他所有途径都无法企及的高度^②,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借鉴社会主义方式发展资本主义的尝试,开创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特色鲜明的“土耳其模式”,成为此后历届土耳其政府参考的蓝本。

(一) 实现经济独立

强大的英法资本成为土耳其谋求经济独立的最大障碍。一方面,1923年英法两国在签订《洛桑条约》时表示,很难在经济领域对土耳其再做让步。另一方面,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过度制裁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正在形成。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必须尽快恢复货币信用,将重建金本位制作为收回经济主权的核心政策,平衡国内和国际收支平衡。^③在此过程中,土耳其巧妙利用美国与英法的矛盾,借助美国的力量成立由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逐步蚕食英法在土耳其经济中的霸权地位。

1923年,土耳其与美国曾达成一份“柴斯特协定”(Chester Antlaşması),以土耳其境内铁路、石油等战略物资的经营权为担保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但由于该计划触犯了英法在土耳其的经济利益,因此遭到了它们的强烈反对。英法在土耳其的经济霸权主要是通过主导央行性质的奥斯曼银行来实现的。直到1935年,土耳其一直将奥斯曼银行发行的货币作为法定流通货币。随着土耳其出口的增加和企业赎回运动,奥斯曼银行发行的货币在1925年开始出现贬值迹象,掣肘了土耳其政府扩大再生产的计划。^④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反对英法两国的经济霸权问题上,土耳其和美国的核心目标是一致的。

1926年,土耳其开始筹备中央银行,并通过美国土耳其投资公司获得了1,000万美元的贷款,占土耳其央行储备金总额的15%。1927年土耳其通过财政

① Özer Özçelik, Güner Tuncer, “Atatürk Dönemi Ekonomi Politikaları,” s. 262.

② Hasan Sabır, “Atatürk’ün Ekonomi Anlayışı,” *Sayıştay Dergisi*, Sayı. 62, 2006, s. 14.

③ İstiklâl Yaşar Vural, “Atatürk Dönemi Maliye Politikaları: Liberal İktisattan Karma Ekonomiye,” ss. 82, 98.

④ Erdinç Tokgöz, *Türkiye’nin İktisadi Gelişme Tarihi (1914-2018)*, 11 Baskı, s. 103.

部发行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套法定货币。^① 1930年,土耳其相继通过《币值保护法》和《中央银行法》赋予国家干涉经济活动的法律依据。1931年,土耳其央行成立,该银行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以货币发行、银行利率和汇率调控三大宏观手段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辅助和干预。^② 1932年开始逐步蚕食奥斯曼银行的权力。^③ 就在中央银行和各大国有控股银行紧锣密鼓地筹备和改组之时,为工业发展而成立的各种中小型地方银行也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短短数年间就成立了21家^④,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

土耳其央行在经济危机期间有效抵御了国外通货膨胀的输入,配合紧缩性财政政策,最终在1931年挽回了里拉持续贬值的颓势,与美元和英镑的汇率水平不仅稳步提升,甚至明显超过了1925年的水平。1939年,土耳其里拉与英镑之间的汇率为5.70:1,相较于通胀最严重的1930年升值了约45%。^⑤ 里拉的升值有效稀释了外国资本在土耳其境内的资产总量,是土耳其经济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因为里拉的升值,土耳其从国外进口工业设备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大大减弱。

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的货币一直都是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印刷。受制于政治、运输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土耳其在货币供应上难以及时填补因货币快速流通而出现的空缺。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只能继续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实行汇率管制。^⑥ 从英法手中夺回金融主导权是土耳其运用国家力量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的巨大胜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经济缺乏独立的顽疾,^⑦ 税收自主性明显提升。根据国内外经济情况,土耳其接连通过实施经济危机税、平衡税、空军援建税和盈利税的决定,^⑧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财政空缺,提高了公共财政支出对工业化的支持力度。

在此过程中,美国代替传统的英法势力成为土耳其公共财政系统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双方协议,美国在1930年~1955年垄断了土耳其火柴、打火机及

① S. Rıdvan Karluk, *Türkiye Ekonomisi: Cumhuriyet'in İlanından Günümüze Yapısal Dönüşüm*, 13 Baskı, s. 410.

② Ibid., ss. 446-447.

③ Erdiñ Tokgöz, *Türkiye'nin İktisadi Gelişme Tarihi (1914-2018)*, 11 Baskı, s. 70.

④ Özer Özçelik, Güner Tuncer, "Atatürk Dönemi Ekonomi Politikaları," s. 263.

⑤ Erdiñ Tokgöz, *Türkiye'nin İktisadi Gelişme Tarihi (1914-2018)*, 11 Baskı, s. 103.

⑥ İstiklâl Yaşar Vural, "Atatürk Dönemi Maliye Politikaları: Liberal İktisattan Karma Ekonomiye," s. 108.

⑦ Hasan Sabır, "Atatürk'ün Ekonomi Anlayışı," s. 17.

⑧ Özer Özçelik, Güner Tuncer, "Atatürk Dönemi Ekonomi Politikaları," s. 263.

相关产品的进出口和专卖权。^① 加之后来“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使得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面倒向美国。从长远来看,随着土耳其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英法留下的真空逐渐被美国资本补位,并以“留存利润”的方式沉淀下来。土耳其的经济独立之路,不过是从英法的“围城”走进了美国的“陷阱”而已。

(二) 推动工业发展

为了适应工业主导权由私人向国家的过渡,土耳其在 1932 年成立了国家工业局(Devlet Sanayi Ofisi),一边安抚私有工业企业,一边加紧规划国家力量在工业化中的布局。^② 土耳其政府以国家资本的方式投资工业推动了经济结构的重要转型,这次转型开启了土耳其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大门,同时也为持续至今的“五年计划”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蓝本。1938 年“一五”计划完成时,土耳其的工业产值与 1930 年相比提高了 124%,而之前的自由主义时期工业产值仅增长了 55%。1930 年~1938 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平均比重为 13.3%,较 1929 年之前的 9.7%有了很大提高。^③

土耳其工业的长足进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耳其初级产品的市场问题,配合进口替代方案,人均收入提高了约 39%。^④ 截至 1940 年,土耳其对基础工业品的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98%的毛纺品、97%的水泥、91%的玻璃制品、84%的棉纺品、39%的纸张和 32%的钢铁制品已经自给自足。^⑤ 通过这一时期的密集建设,对土耳其历史影响深远的国有企业开始崭露头角。^⑥

(三) 促进农业改革

在 1923 年~1938 年期间,土耳其在本质上仍然是农业国,农业的平均产值约占 GDP 总值的 44%,约占出口总额的 80%。^⑦ 对于当时的土耳其来说,农产品在财政上最主要的用途是换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以及偿还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欠款。然而,1929 年之前的关税半独立和后来的经济危机,迟滞了农业在土耳其经济恢复中的重要作用。换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土耳其建国时经济基础极其薄弱,

^① Mehmet Dikkaya, Adem Üzümcü, Deniz Özyakışır, *Osmanlı'dan Günümüze Türkiye'nin İktisadi Tarihi*, s. 104.

^② Dündar Sağlam, “Devletçilik İlkesinin Gelişmesi ve Günümüzdeki Sonuçları,” ss. 76-77.

^③ TÜİK, *İstatistik Göstergeler (1923-2011)*, Ankara, Aralık 2012, s. 733.

^④ TÜİK, *İstatistik Göstergeler (1923-2011)*, s. 730.

^⑤ Mehmet Dikkaya, Adem Üzümcü, Deniz Özyakışır, *Osmanlı'dan Günümüze Türkiye'nin İktisadi Tarihi*, s. 101.

^⑥ N. Oğuzhan Altay, “Türkiye’de İktisadi Dönüşümlerin Sosyo-Ekonomik Sonuçları Üzerine Bir Deneme,” *Dokuz Eylül Üniversitesi İ.İ.B.F. Dergisi*, Cilt. 15, Sayı. 2, 2000, s. 52.

^⑦ Hüseyin Şahin, *Türkiye Ekonomisi*, s. 53.

因此经济危机对土耳其的伤害反而没有其他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严重。^① 土耳其在工业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取舍,其实就是构建工农业循环经济的体现,如果要在工业计划中将农业的价值最大化,那么就非常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农业及整个社会采取相应的变革。

作为经济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部门,农业实际上承担了土耳其 80% 的劳动力就业与 44.5% 的国民收入贡献率,然而自从工业“五年计划”开启后,农业获得的补贴和投资锐减至国家总投资的 10% 左右^②,占人口比例最多的农民收入缩水比例达 29%^③。为了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土耳其政府借着“骨干运动”的东风,将争论了数年的小麦专卖制度付诸了实施。^④ 1932 年,土耳其在农业银行内部成立农产品办公室(Toprak Mahsulleri Ofisi),规定了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格,并在 1938 年将其与农业银行剥离,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该机构全面管理各农产品的价格,开启了由国家调控、管理农产品价格制度的历史时期。

虽然土耳其在建国初期进行了范围较大的土地改革,但粗放的改革方式也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改革中政府拆分国营农场就近分配土地的政策,虽然在短时间内缓解了人地矛盾,但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小农经营,碎片化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可耕种土地面积的 65.1%,致使机械化生产难以大面积展开。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了对农村的资本主义改造,留下了大量封建地主和土地资本家,虽然给予了农民土地却并未杜绝土地兼并,因此产生了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据统计,从 1923 年~1937 年,土耳其迁徙的农民共有 771 610 人。^⑤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土耳其在 1934 年针对农民迁徙问题制订了新的“土地安置法”,并据此在 4 年中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配了共 30 万公顷的土地。^⑥ 此外,为了保护这些小农的利益,凯末尔于 1937 年在大国民议会上宣布,将针对大农场主进行改造,依照人口密度和土地肥力,限制其扩张范围。^⑦ 通过宏观和微

① Özer Özçelik, Güner Tuncer, “Atatürk Dönemi Ekonomi Politikaları,” s. 260.

② Cem Emrence, “Turkey in Economic Crisis (1927-1930): A Panoramic Vis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9, No. 4, 2003, p. 68.

③ Mehmet Dikkaya, Adem Üzümcü, Deniz Özyakışır, *Osmanlı'dan Günümüze Türkiye'nin İktisadi Tarihi*, s. 101.

④ İlhan Tekeli, Selim İlkin, *Türkiye Belgesel İktisat Tarihi 2: Uygulamaya Geçerken Türkiye'de Devletçiliğin Oluşumu*, ss. 109-110.

⑤ Erdinç Tokgöz, *Türkiye'nin İktisadi Gelişme Tarihi (1914-2018)*, 11 Baskı, s. 88.

⑥ Hüseyin Şahin, *Türkiye Ekonomisi*, 16 Baskı, s. 54.

⑦ Ali Ata Yiğit, “Türkiye'nin Tarıma Dayalı Sanayi Politikası (1923-1938),” *Doğuş Üniversitesi Dergisi*, Cilt. 13, Sayı. 2, 2012, s. 319.

观两个层面上的改革,土耳其国内农产品的价格逐渐稳定,以国家机构为桥梁的工农互哺模式成型,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提升。

(四) 实现收支平衡

在国家的主动干预下,土耳其的货币政策走向稳健,这一举措对于“四个黄金平衡”中的对外贸易平衡,意义极为重大。1930年,稳健的货币加上自主的关税调节,土耳其第一次实现了贸易顺差。1934年11月1日,凯末尔在大国民议会中总结道:“要继续将保持贸易平衡、取得顺差作为一切对外贸易的核心出发点。”^①

从1929年~1938年期间的进出口指标来看,1932年的贸易额为历年来最低,出口4800万美元,进口4100万美元;1931年为极其少见的进出口贸易平衡的年份。土耳其进口量的锐减与工业计划的实行有很大的关系。通过工业“五年计划”,土耳其确定了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类型,经济结构的转变推动出口结构的转型,工业品的年平均出口比重从自由主义时期的8.6%提高到10%。^②

1940年之前,德国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占据土耳其出口的44%和进口的46%。根据统计,土耳其约有75%的羊毛、70%的棉花和铬矿流向了德国,而从德国流入的纺织品、钢铁及机械产品、化学品等则分别占据土耳其内需的78%、67.9%和55.4%。^③在德国纳粹主义不断发酵的背景下,与德国经济高度依存的土耳其开始担心,如果继续保持这种高度依存的经贸关系,土耳其或许会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的覆辙。

因此,自1936年起,土耳其开始调整外部供需链条,将贸易重点转移到英国和法国,稀释德国在土耳其贸易中的比重,英国取代德国成为土耳其工业化建设的设备供应商。作为交换条件,土耳其获得英国提供的1900万英镑的贷款。然而,由于自土耳其建国以来的贸易惯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在土耳其的贸易体系中仍然具有优势。

除了对外贸易之外,另一个影响收支平衡的因素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贷款清偿义务。根据1925年与债权国达成的协议,1929年土耳其将支付第一笔总额200万里拉的本息。然而,随着土耳其国内经济政策的转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逐步增强,为了抵抗经济危机,土耳其更倾向于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国内的工业建设。因此,在1933年和1938年,土耳其两次与债权国达成新的协议,不断

^① Hasan Sabır, “Atatürk’ün Ekonomi Anlayışı,” s. 9.

^② Mehmet Dikkaya, Adem Üzümcü, Deniz Özyakışır, *Osmanlı’dan Günümüze Türkiye’nin İktisadi Tarihi*, ss. 101-103.

^③ Hüseyin Şahin, *Türkiye Ekonomisi*, 16 Baskı, s. 58.

压缩借款利息和还款总额。1930年~1938年,土耳其的GDP年均增长率为6.4%,较1929年之前10.95%的平均增长率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下降。^①但受益于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工业建设计划,土耳其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却有明显的提高。

四、土耳其“国家主义”的当代影响

1929年~1938年是土耳其历史上相对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在经济危机这一外部变量的干扰下,很容易将1929年看作是土耳其“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分水岭,从而忽视了土耳其从建国伊始就存在的国家干涉经济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土耳其的“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其产生和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领导人的好恶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共同影响。所以,土耳其学术界更倾向于将建国前15年的经济建设划入凯末尔研究的范畴。

在这15年中,凯末尔领导土耳其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之后,始终面临一个突出矛盾,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兼容。土耳其加入资本主义阵营的考虑之一就是增加奥斯曼帝国遗留债务的谈判筹码,尽快赎回外国资本手中的工矿企业。然而,奥斯曼帝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②与西方的封建庄园有着本质区别,这就间接决定了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土耳其缺乏相对应的社会阶级。而土耳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凯末尔在取得军事胜利、评估世界局势后嫁接至土耳其的。1929年的经济危机为凯末尔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一个契机,“国家主义”的管理方式有效整合了农村和城市的资本,大大推动了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为土耳其提供了通往资本主义世界的铺路石。以此为跳板,土耳其开创了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不排除私人企业参与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强调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

(一) 冷战结束前“国家主义”对土耳其经济的影响

凯末尔逝世后,直接掣肘伊诺努的力量不复存在,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伊诺努执行了更为严苛的经济管制政策,国家力量深入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并在1947年前后发起了一场“新国家主义”(yeni devletçilik)的革新运动。

^① TÜİK, *İstatistik Göstergeler (1923-2011)*, s. 693.

^② 奥斯曼帝国的绝大多数土地属于国家,不允许自由转让,且禁止农民弃田出走。参见 İrfan Kalaycı, “Atatürk’ün Kalkınma Modeli (AKM): Günümüz Sanayisi İçin Kazanımlar,” s. 155.

然而,土耳其在对抗英法资本霸权时的强势做法,逐步开始显现出负面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迅速巩固了在土耳其的实力,并且利用经济影响力培植起了诸如民主党(Demokrat Parti)等亲美政治势力。

土耳其一直被西方阵营视作反苏的桥头堡,因此,在经济层面翦除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对于美国来说很有必要。在此背景下,土耳其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国有经济在民主党执政的十年中遭受到了重大打击,美国资本支持下的私人资本获得了快速发展。“马歇尔计划”的核心是欧洲复兴,而历史上土耳其与欧洲诸国的经济相辅相成,所以,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使二者在经济发展上以美国资本为基础强化联动,在固化欧土双方经济联系的同时,也增强了土耳其抵抗苏联影响的能力,为将来土耳其要求加入“欧盟”埋下了伏笔。

土耳其在初期两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下,以“国家主义”为指针,艰难地将各个经济部门和松散的民间资本整合在一起。^①然而,民主党政府在“马歇尔计划”中产生了致命的错觉,认为土耳其的市场已经如同欧洲一般成熟,盲目地放任市场优先,经济繁荣局面仅维持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诩自由的民主党在执政末期面对混乱的国家经济,反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国家管制模式,甚至进行恐怖统治。同时,民主党时期所引发的经济骚乱打破了“四个黄金平衡”的基调,埋下了土耳其财政入不敷出的祸根。

1960年军事政变后,伊诺努拨乱反正,提出了长达15年的“长期发展规划”(1963年~1977年),其中包含三个阶段的五年计划。在这15年中,土耳其继续维持对工业的高投入^②,通过对工业的控制,国家力量逐步加强了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现了对汽车、钢铁、金融等行业的垄断,但并未取消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换句话说,伊诺努所做出的改革是对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国家主义”发展的继承,并在冷战的特殊环境下发展出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③,这可以说是伊诺努时代“土耳其模式”的第二次蜕变。

1963年~1977年国家力量在经济领域的高速运转,正式建立起了庞大的国

^① 因为伊兹密尔经济会议通过的决定在很多方面不具备强制约束力,民间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维持现状且各自为政的特点。1929年之前,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商业、金融等领域,各个财团彼此间的分散也不利于政府合理调配资源推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② 1973年~1977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土耳其政府对工业的投资比例高达45.4%。

^③ A.Ü. Siyasal Bilgiler Fakültesi Maliye Enstitüsü, Türkiye Ekonomi Kurumu, *Atatürk Dönemi Ekonomi Politikası ve Türkiye'nin Ekonomik Gelişmesi Semineri*, Ankara: A.Ü. S.B.F. Basın Ve Yayın Yüksek Okulu Basımevi, 1982, s. 134.

有企业集群,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土耳其社会经济活动,其影响力至今依然存在。此后,不论是政府更迭还是军事政变,土耳其以五年计划的方式规划国家经济发展的做法都未曾改变,政府对国家经济秩序及发展的指导性、前瞻性作用,也通过1961年宪法被正式确定为土耳其的基本国策之一。

虽然土耳其从“国家主义”的经济模式中受益,成为西亚地区屈指可数的工业化国家之一,但高度密集的指令化生产也带来了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资源浪费、体制僵化等一系列弊端。此外,鉴于“最高经济议会”中深厚的军方背景,土耳其军方在1960年军事政变后迅速成立了军人互助基金会,将军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加以强化和延续,并通过长达15年的国家主义建设掌握了诸如钢铁、化工、金融等行业的主导权。也正是因为有此基础,军人才能在1971年、1980年和1997年通过连续发动政变来颠覆政府。

(二) 冷战结束后“国家主义”在土耳其经济中的沉浮

凯末尔曾经多次强调,经济的胜利要比军事的胜利更加稳固,但要做到经济的胜利,首先就应该将“财富”转化为“资本”^①,而要实现这一转化,工业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基于此,几乎历届土耳其政府都将国家工业化当成其执政的关键目标,特别是“长期发展规划”期间更是不惜成本地发展工业。

时代的发展变化具有自身的规律与特征,这要求土耳其政府善于把握时代脉络,妥善定位国家力量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以更好地协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土耳其模式”的健康发展。然而,当时的土耳其政府一方面片面强调工业化,另一方面忙于国内政治斗争,疏于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政策的连贯性也因政府的频繁更替受到显著影响,导致国有企业的亏损逐步加大。例如,在1994年在土耳其36.8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中,国有企业的亏损就有24.7亿美元。就经济稳定发展来说,1986年之前历届政府的执政水平都与凯末尔时期存在一定差距,几乎每隔十年土耳其就会出现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②

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背景下,1980年军方再次发动政变接管政权,此后一场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厄扎尔的酝酿下逐渐展开。厄扎尔被誉为“土耳其的经济设计师”,其政策核心主要有两点:一是放开汇率管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二是出售亏损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③在美国摩根集团的推波助澜下,厄扎尔

^① İrfan Kalaycı, “Atatürk’ün Kalkınma Modeli (AKM): Günümüz Sanayisi İçin Kazanımlar,” s. 171.

^② Mustafa Aydın Aysan, “Atatürk’ün Ekonomik Görüşü: Devletçilik,” s. 644.

^③ Mehmet Dikkaya, Adem Üzümcü, Deniz Özyakışır, *Osmanlı’dan Günümüze Türkiye’nin İktisadi Tarihi*, s. 175.

政府将运输、水泥、畜牧等领域的 32 家国有资产进行出售。表面来看,厄扎尔的改革似乎为土耳其指明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但就本质而言,它依然是在凯末尔的平衡理论框架中,在“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寻求的新的平衡点。^①

1995 年,土耳其发布第七个五年计划(1996 年~2000 年),首次提出土耳其应该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提法与 1996 年 1 月开始生效的“土欧关税同盟”有直接关系,而这一协定的生效也可以看作是“马歇尔计划”在后冷战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历史角度来看,土耳其谋求的经济独立一直没有真正完全实现。土耳其先是被英法控制金融命脉,后是受到美国资本的无形渗透,又由于历史惯性始终未能摆脱和根治经济基础脆弱的顽疾。

在外部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和内部国家主导经济的背景下,以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为代表的“民族观念运动”(Millî Görüş)应运而生,并由此成立了繁荣党(Refah Partisi)。这一运动在经济领域强调政府的无息扶持,同时加强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联系。这是“国家主义”在伊斯兰底蕴深厚的国家,经过数十年发展的一种趋势,同时也构成了当前土耳其国内经济三足鼎立版图的雏形,即世俗财团、军队财团和伊斯兰性质的财团。

在厄扎尔放开外汇管制、突破国有企业的防线之后,此前受到限制的私有企业开始瓜分国有企业的资产,以 1971 年成立的土耳其工商业联合会(TÜSİAD)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为当前土耳其势力最为庞大的世俗财团。伴随“国家主义”发展而经济实力大涨的军方财团,此时也通过收购、改制等方式将原国有企业收入囊中,军人互助基金会的实力快速膨胀。伊斯兰性质的财团则与“民族观念运动”不无关系,尤其在埃尔巴坎掌权之后,其以 1990 年成立的独立工商业联合会(MÜSİAD)为跳板,经济实力获得了大幅增长。伊斯兰财团的快速扩张引起了其他两大财团势力的恐慌,军方借助经济上的强势,于 1997 年发动“软政变”迫使埃尔巴坎下台,暂时减缓了伊斯兰财团快速扩张的趋势。

2001 年,原繁荣党党员埃尔多安组建正发党,并于次年赢得大选并一直执政至今。正发党上台之后,仿照伊诺努长达 15 年的经济规划,以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政府制定的 2001 年~2023 年长期规划为蓝本,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奋斗目标,并在 2011 年前后阐释为当前为人所熟知的“2023 年远景规划”。这一规划最早体现在正发党上台后颁布的首个“五年计划”,即土耳其第九个五年计划(2007 年~2013 年)。在该计划中,多次提及高新技术的快速迭代和信息化社会,强调

^① İrfan Kalaycı, “Atatürk’ün Kalkınma Modeli (AKM): Günümüz Sanayisi İçin Kazanımlar,” s. 172.

国家规划下的地区发展平衡。在这一发展规划背景下,一场“厄扎尔强化版”的私有化改革浮出水面。如果说厄扎尔的私有化主要针对亏损的国有企业,那么埃尔多安的矛头则是对准了所有的国有企业。

如果据此就断言“国家主义”在土耳其的没落,未免有些为时过早。这场表面上看似公平的私有化运动,其主导权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正发党在财政部之下设立了专门的私有化管理局,将国有资产列出清单分批次出售。如果细究这些国有资产的最终走向,则发现其大部分落入了三大财团组织的囊中。根据土耳其工商业联合会在1992年公布的一份文件,其在1986年就参与了由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进程。正发党在新时期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实质上就是厄扎尔时期私有化运动的延伸。不同之处在于,正发党所依靠的经济力量相对多元化,既折射出执政党的政治光谱,又以民族精神为口号团结了绝大多数的国内资本,使之源源不断地为其塑造“执政神话”。

2013年之后,相对有价值的国有企业基本清盘。与此同时,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衰退明显。此时正发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却愈加频繁,一方面在五年计划内部频繁制定为期三年的“中期计划”,另一方面埃尔多安数度干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近年来,随着国有银行、证券等金融部门高层的人事变动,正发党对土耳其国民经济的掌控力度空前加强。属于正发党时代的“土耳其模式”再次站到了十字路口。

土耳其“国家主义”的出现,包含土耳其人追求民族独立的深层期盼,是数代土耳其国家领导人共同探索出的一条经济发展之路。然而,从始至终伴随的高额外债使得西方资本对土耳其国民经济的渗透异常深入,由此也决定了土耳其“国家主义”时常会脱离既定的运行轨道。虽然正发党上台以后在市场和国家宏观调控的把握上可圈可点,但它仍然是历史经验的延伸,与“新土耳其”的目标似乎仍存在本质上的距离。2023年在即,本就疲弱的土耳其经济又受到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变数日益增多。土耳其经济模式无论是另辟蹊径,还是在原有框架内亡羊补牢,都存在很大的探索和解读空间。

(责任编辑:邹志强 责任校对:赵军)

Abstracts

03 The Evolution of Official Discourses on “Kurdish Issu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Abstract The cognition of the so called “Kurdish Issue”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urkish Republic has undergone some changes since late 19th century.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Kurds were mainly perceiv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Ottomanism and Islamism ,and the ethnic identity of Kurdish people was not highlighted. During the Kemalist era , the Turkish state officially adopted an assimilation policy towards the Kurds , whose ethnic identity was elaborately denied and obliterated. Kurdish issue in the 20th century was mainly regarded as a problem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the state. In the 21st centu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Recep Tayyip Erdoğan , AKP government proposed a new policy towards Kurds which acknowledged the existence of Kurdish identity and Kurdish issue by differentiat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sub-identity. AKP government tried to solve the Kurdish issue ,PKK in particular ,through a “peace process”. Unfortunately , the “peace process” failed du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Currently , the official policy and discourse of Turkish state towards “Kurdish Issue” has shifted back to the concerns over the priority of national security.

Key Words Turkey; Kurdish Issue; Discourse; Kemal Atatürk; Recep Tayyip Erdoğan

Author ZAN Tao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Department , Director of Turkish Studies , Peking University.

25 Turkey’s Safe Zone Policy in Northern Syria: Causes and Trends

Abstract In March 2020 , new conflicts broke out between the Turkish army and the Syrian and Russian armed forces in Syria’s Idlib province and other place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Syria deteriorated again. The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ounced in September that it would increase its troops in northern Syria , while Russia has repeatedly launched air strikes against Syrian rebels in that area ,and the game between parti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egion has further escalated. In Turkey ’s Middle East strategy , the northern part of Syria has always been a strategic place for Turkey to advance geopolitical interests , and the main support for its goals of expanding its territory , 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t forces , uniting the U.S.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 combating Kurdish separatist forces , and building regional hegemon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yrian crisis , Turkey’s northern Syria strategy has further deepened and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ecurity zone in northern Syria , making it a basis for Turkey to contain Kurdish forces , maintain its own security , and compete for interests and power with parti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egion. However , the lack of a long-term security mechanism , the inability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refugee problem , the ambiguous positioning and its core purpose of serving Turkey ’s regional hegemony have added uncertainty to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Syrian crisis.

Key Words Turkey; Northern Syria Strategy; Safe Zone Policy; Geopolitical Maneuvering

Author LIU Chen , Ph.D. , Lecturer , School of Arabic Studies ,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MA Xiaolin , Professor ,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44 Analysis on Statism of Turk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Kemal Era

Abstract Due to the complicated geopolitical pattern and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 two types of economic philosophies “Statism” and “Liberalism” have constituted the path of Turkey’s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 the two kinds of economic philosophies oppose each

other while also complement each other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Because of the impact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29, the localized “Statism” proposed by the “Kadro Movement” cemented foundation of the public opinion and became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Kemalism. I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and social reforms as well as balance of payments. As a result, the dualistic economic theory not only generated new powerfu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also explored a special development model that combines government with market, which domina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of Turkey for decades. In this study,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d effects of “Statism” thoughts in Turkey will be analyzed. This study is also benefi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economic reforms in Turkey.

Key Words Turkey; “Statism”; “Kadro Movement”;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Plan

Author LI Xinjun, Ph. D. candidate, Center for Turkish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66 The Diyanet in Turkey’s Foreign Relations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Iran and Saudi Arabia, Turkey is to become a third power of international Islamic politics. However, the secularist reform under Kemal Atatürk as well as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distinguishes Turkey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 the context of post-9/11 and “Arabic Spring,” the Turkish Model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tibility of Islam and secularism has been admired by many Islamic countries. During the reign of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Recep Tayyip Erdoğan, both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has become more Islamic in Turkey. Diyanet as a key religio-political institution takes a lot of diplomatic missions, such as the overseas branches, repairing and building mosques, and training of Imams. But Turkey’s “rediscovery of the Middle East” is interpreted as neo-Ottomanism. It shows an expansionist character, such as Turkey’s involvement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wars of Syria and Libya; in the meantime, it also represents the return of Islamism in both Turkey’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Key Words Islamic diplomacy; Diyanet;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 Recep Tayyip Erdoğan

Author Xin Sisi, the doctoral student of Center for Turkish Studies at Shanghai University; Liu Yi, Ph.D., Professor,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 Global Politics at Shanghai University.

83 De-radicalization in Lebanon: Core Concepts, Policy and Practice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oriness of Lebanon’s security stems from a seri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ng-term environment of conflicts, cross-border activities of violent actors, and continuous intervention by intra-regional and outside powers. The use of insurgent movements, sectarian conflicts and refugee issues to seek opportunities of development, builds extremist ideologies, and strengthen armed forces constitutes a typical mode for violent extremism’s interaction with Lebano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regional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its de-radicalization project through top-level desig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erial coordination,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banon’s de-radicalization model inclu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radicalization concept with prevention first and control supplemented, emphasizing the absorption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stablishing a working mechanism of de-radicalization via cross-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building a multilevel prevention system from the state to the individual. Lebanon’s government-led approaches, with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to de-radicalization of the ‘Local Prevention Networks’ at municipal level and the ‘Reconciliation with Life’ program for detainees of teenagers and young adul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to countries in conflicts and their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Lebanon; Extremism; De-radicalization; ‘Local Prevention Networks’

Author BAO Chengzhang,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